

从解冻 走向建交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

主编：宫 力
[美] 威廉·C·柯比 罗伯特·S·罗斯

1 9 6 9 — 1 9 7 9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合作研究项目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从解冻 走向建交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

1969—1979

主编：宫力

[美] 威廉·C·柯比 罗伯特·S·罗斯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宫力，(美) 柯比，(美) 罗斯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

ISBN 7-5073-1635-1

I. 从… II. ①宫…②柯…③罗… III. 中美关系—研究—现代 IV. D8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2457 号

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

主 编/宫 力 [美] 威廉·柯比 [美] 罗伯特·罗斯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张新勇
版式设计/翟国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东方和鼎文化传播

印 刷/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787×1092 16 开 21.5 印张 3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73-1635-1/C·221 定价：4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序言一	宫 力 (1)
序言二	[美] 威廉·C·柯比 罗伯特·S·罗斯 (19)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李丹慧 (27)
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	
——1969—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	
	[加] 罗伯特·阿奇奈利 (65)
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	
——1972—1978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宫 力 (119)
赢得了奖杯 丧失了机遇	
——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1979)	[英] 罗斯玛丽·福特 (163)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 (1969—1979)	王仲春 (193)
1969—1979年苏联的对美与对华政策	[俄] 维塔利·科兹列夫 (221)
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	李 捷 (263)
台美关系：1969—1978	裘兆琳 (295)

CONTENTS

Foreword 1	Gong Li (1)
Foreword 2	William C. Kirby and Robert S. Ross (19)
The Relaxation of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the Aid to Vietnam to Resist US	
—— Vietnam as a factor i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Chinese diplomacy	
	Li Danhui (27)
In pursuit of a Taiwan modus Vivendi	
——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Taiwan Issu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ino-	
American Rapprochement, 1969–1972	Robert Accinelli (65)
The Difficult Wa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	
—— The Changes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US 1972-1978	Gong Li (119)
Prizes Won, Opportunities Lost	
—— The US Normalization of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72-1979	
	Rosemary Foot (163)
Soviet Factors in the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1969-1979	
	Wang Zhongchun (193)
Soviet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79	
	Vitaly Kozyrev (221)
From the Thawing to the Normalizati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Sino-US Relations	Li Jie (263)
Taiwan's Policy toward the U.S., 1969-1978	Jaw-Ling Joanne Chang (295)

序言一

宫 力

本书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项目第三阶段的最新研究成果，主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再探讨。参加本阶段研究的学者除了来自中、美、英、加的中美关系和外交史专家（他们为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之外，又新增加了俄罗斯和中国台北的学者，从而使本项目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内容也更加丰满。

本书收录的论文依据多国、多方档案文献资料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深入分析和探讨了1969—1979年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建交这一关键历史阶段，各方公开的和幕后的外交行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主要障碍；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中美双方是如何经过谈判克服困难，逐渐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过程。

本阶段的研究是在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其研究成果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逻辑联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

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合作研究中美关系始于1995年。这个项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总课题之下所设的每个具体题目，都由中美双方学者相应地各自独立完成一篇论文。中国学者侧重研究中国对美政策，美方学者侧重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充分地发挥中美学者各自的优势，主要依据本国的档案资料，提供最新的、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该项目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中美合作项目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双方的中美关系和外交史专家就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四个基本问题分别进行研究。这四个问题是：5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环境；中美两国国内局势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中方作者有中共中央党校官力教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江英研究员；美方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普鲁森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舒尔辛格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夏勒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福特教授。该项目的中方主持人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中心姜长斌教授，美方主持人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伯特·罗斯教授。1996年10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双方作者对各自的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最后汇编成书，以《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再探讨》为题，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8年正式出版。

经过第一阶段严谨的探讨和争论，中美双方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提出了更多值得研究的题目。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的研究。内容仍是“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具体论文题目是根据第一阶段北京会议所提出的值得关注的一些重大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而确定的。其目的是对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些题目分别是：毛泽东外交政策思想的发展变化；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

素；中美外交决策机制与中美关系。中方作者有中共中央党校官力教授、刘建飞教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江英研究员。美方作者有加拿大的普鲁森教授、美国的舒尔辛格教授、美国史密斯学院戈德斯坦教授、哈佛大学柯比教授。项目的中方主持人仍然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中心姜长斌教授，美方主持人还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斯教授。1998年4月底5月初，双方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了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200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将第一、二阶段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以《从对峙走向缓和：1955—1971年中美关系再探讨》为名正式出版。此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两个阶段的成果用英文出版，该书已存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受到其他国家学术界的关注。

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中美两国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而又难以调和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克制，客观评价对方对自己利益造成的威胁。冷战时期中美之间四次冲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历史说明，当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对他们自己国家的能力和对方给自己国家构成的威胁形成现实主义的评价之时，利益冲突就可能被制止，紧张局势就有可能受到控制。即使当利益冲突反映了实用主义的国家利益的考虑时，通过谈判和相互妥协，冲突也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得到解决。

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还表明，谈判是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的重要方式。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并未直接导致中美冲突的缓和，但却对缓和起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谈判，双方及时了解了对方的利益所在和战略意图，从而避免了误会。在谈判中，要维护双方根本利益并能在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上合作，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出适当的妥协。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实现缓和，还是70年代末实现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都是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两国的政治家为了更大的战略利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必要的妥协。没有这种妥协，两国关系是很难有突破性发展的。

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外交决策都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如何处理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使内政对外交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并使内政对外交产生的动力充分发挥效力，是双方战略家和决策层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此外，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受到外部因素，如苏联因素和日本因素及越南因素的影响。如何把握这种影响，使其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也是决策层和战略家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和研究条件的逐步成熟（美方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的档案逐渐开放），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项目第三阶段的研究于2000年启动，双方确定的研究主题为“1969—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再探讨”。四个子课题的题目分别是：1969—1972年的中美关系；1973—1979年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海峡两岸内部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方作者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李丹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官力教授、国防大学王仲春教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美方邀请的作者有英国牛津大学的罗斯玛丽·福特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阿奇奈利教授、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的科兹列夫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袁兆琳教授。中美合作项目的中方主持人是官力教授，顾问是姜长斌教授，主持人助理为刘建飞教授；美方主持人是威廉·柯比教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和罗伯特·罗斯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项目的经费仍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经过艰苦的研究、讨论和写作，作者们如期完成了论文，这八篇论文的题目是：《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李丹慧）；《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1969—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阿奇奈利）；《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官力）；《赢得了奖杯 丧失了机遇——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1979）》（福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王仲春）；

《1969—1979年苏联的对美与对华政策》(科兹列夫);《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李捷);《台美关系:1969—1978》(裘兆琳)。

按照预定计划,中美双方于2002年1月18—19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再探讨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除论文作者、项目主持人、特邀评论员外,还有中美两国的一些前外交官,如美方有洛德(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前驻华大使),付立民(前驻沙特大使),索罗门(前驻菲律宾大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付高仪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中方参会的前外交官有柴泽民大使、朱启祯大使、李道豫大使、李风林大使、王立总领事。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对论文和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点评,给本项研究增添了光彩。

中外学者们在这次有意义的研讨中就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当前的中美关系展开了双向交流,其中包含观点交锋和思想碰撞,既达成了不少共识,澄清了一些问题,也缩小了许多分歧。在共识方面,代表们都认为:要想使中美关系顺利发展,除了客观认识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外,还需要在利益矛盾的方面达成妥协。从1969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缓和并最终正常化,就是由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能够求同存异,不断达成妥协,而正常化进程拖延长达10年之久,也主要是由于存在着台湾因素这个障碍。代表们还认为,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美国的“水门事件”及党派斗争,限制了第二任尼克松政府和继任的福特政府的手脚,使其难以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有所作为。中国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特别是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对美政策,特别是使对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周恩来和邓小平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小心翼翼,难以越雷池一步。

当然,由于双方学者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和所使用的资料不尽相同,因此讨论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争论。主要是:第一,美方有的学者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受国内政治变动

的影响，对美政策变化很大；而中方学者认为，1971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对美政策的基本方针，后来虽有干扰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反倒是美国由于总统不断更换，导致对华政策起伏较大。第二，美方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在1974年联大上阐述的中国对外政策及在中美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表明，邓小平在发展对美关系上并不积极，1978年时他又积极发展对美关系，表明他的对美政策思想没有一贯性；而中方学者认为，邓小平在1977年之前，并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而是执行者，他在联大的讲话也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思想。在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变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才真正体现出来。第三，有的学者认为，在与中国缓和关系时，美国特别注意保护台湾方面的利益，不愿意承担抛弃“老朋友”的坏名声。但也有代表提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政府很晚才将尼克松访华的消息通知台湾当局，而法国和日本在决定与中国建交时，很早就将这个信息通知台湾当局。第四，美方邀请的学者认为，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都不接受“两个中国”方案，而是坚持自己是唯一合法政府，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理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方代表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大陆来说，不存在“玉碎”问题，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最大限度的代价就是推迟一至两年恢复合法席位。中方学者刘建飞指出：在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这一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进程可能要早好几年实现。到1971年7月，世界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超过同台湾国民党当局“建交”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表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美国只不过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已。新中国的建立和不断强大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这个大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第五，美方学者普遍对中国海峡两岸当年都坚持统一立场（包括20世纪90年代前的台湾国民党当局）表示不太理

解。中方章百家研究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统”观念根深蒂固，延续至今。国民党历史中讲到，蒋介石是周公的后代，其用意是找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道统”依据。国民党把自己的“道统”推到极限，共产党只好从世界的角度寻找“道统”依据。但是，他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突破了传统的“道统”观念。

中外学者上述有深度的讨论和争鸣，有助于双方换位思考，也有利于将研究进一步地引向深入，并由此促进学术繁荣。

在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结束后，中美双方的项目主持人对与会论文提出了详尽的书面评阅和修改意见。中美双方的作者们据此对论文作了新的补充和修改，并吸收了北京会议讨论中的有益意见和建议，经过出版单位组织专家进行筛选，最终形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后入选本书的这些论文可以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厚积薄发，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涉及的内容也是精彩纷呈。

李丹慧研究员的论文以角度新颖和资料丰富见长。她在《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一文中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过程中越南因素的影响这一新的视角，考察并分析论说了中国在美国关系缓和的各阶段中，对越美和谈及对越援助等方针的变化情况及原因。她提出：毛泽东考虑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的动向最初反映在1968年11月他对越美和谈从反对到赞成这种态度的变化上。由于美国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在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国在对美苏和对苏越两个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大的趋向上看，中国外交方针的侧重点这时已开始了由革命向务实的转变。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未能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并且还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面对来自南方的苏

越联盟的新的挑战。第二，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第三，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第四，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次转型。

与此相对应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阿奇奈利的论文，他在《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1969—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用非常翔实的资料系统地考证了在中美缓和过程中在台湾问题上所达成的暂时妥协的历史过程。论文提出了如下有新意的观点：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两国之间“最难解决的唯一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双方谈判时关注的焦点，也是影响谈判进程的最大障碍。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和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没有实现，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陷于僵局。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开启了正常化之路，但是也给未来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达成妥协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难题。二、美国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利益，在与中国发展关系时，想尽可能地不得罪

“老朋友”。为此设计了许多对华与对台政策方案，其中包括：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保持外交关系；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这些方案都未能行得通。三、美国战略家当时认为，台湾对于美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台湾地处中国东南腹翼，居于从日本至东南亚岛链的中心位置，因此“是美国实施地区支援，进行通信和情报活动的主要基地”。此外国民党军队起到了牵制一大部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作用，否则这些共产党军队有可能调到其他地方。美国涉及中国大陆的“重要情报”都是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得到的。四、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虽然尼克松执政之时，美国国内舆论中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赞成应对华执行一条更加积极的政策。但是公众中对华持怀疑态度的比例之高和赞成与台保持外交、军事关系的比例相当。保守派领导人和政客们对台的同情、支持尤其强烈。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符合美国民意。美国国内公众对尼克松总统宣布计划访华的消息持谨慎的欢迎和赞成态度。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仍对中国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但还是赞成总统访华。虽然有一些反共的右翼分子怀疑或不同意尼克松的对华战略，但是右翼分子没有进行联合一致的反对。六、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上，美国战略研究部门预见到，美国现行的策略（阻止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将在不久遭到失败。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失败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让代表席位的问题寿终正寝，一方面给改善对华关系增加了希望，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台湾国民党政府继续依赖美国。七、最终决定联合国投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美国的外交活动，而是联合国成员。联合国多数成员普遍希望把“中华民国”驱逐出这个国际组织。当然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促使许多国家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转为支持中国。八、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虽然加速了国际社会从政治上孤立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进程，然而却促使台湾当局将注意力转移到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个基本目标上。致力于经济发展才是台湾生存能力和稳定的根本因素。九、在联合公报内容的谈判上，中美双方的出发点有很大的差异。正如基辛格对周恩来所说：

“(对公报内容)总理追求的是表述明确,而我努力想使其用语保持暧昧。”基辛格这一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双方在美国对台湾问题上的表达存在分歧的关键所在。

官力教授在《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一文中分析了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特别是双边关系互动和台湾因素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他认为:1972—1978年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灵活性”,但中国方面对美国是否履行上海公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方满意地看到,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发展,美国最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中美之间还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进展。但在此之后,美国方面由于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从而给中美关系正常化造成了困难。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回旋余地相对较少,只能守住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以“日本方式”为底线,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静观美方的变化。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1976—1978年,中国领导层处于调整、过渡期间,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变化。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四人帮”的垮台,党内健康力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邓小平成为中方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美建交谈判的焦点转到建交后,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在

这两个问题上，中方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在建交后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从大局出发，决定保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以不影响建交时间。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上，中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为了防范台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而美国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承认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作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英国牛津大学罗斯玛丽·福特对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台湾问题的探讨有其独到的见解。她在《赢得了奖杯 丧失了机遇——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1979）》一文中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受多种因素制约，然而，美国在决定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美中关系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战略意义上，片面追求所谓的全球目标，从而忽略了有关台湾未来的关键问题。这表现为：一、在谈判涉及有关台湾未来政治地位、美对台出售武器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时，由于早些时候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加之美国在其与台未来关系上目的不明确，削弱了美国在谈判最后阶段的讨价还价优势。二、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诸多方面都不完整，因而双方都不十分满意。在台湾未来政治地位问题

上，美国本想保留灵活性，但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一些秘密声明和承诺，使美国在谈判初期过早地放弃了过多的东西。到了1972年，台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并且美国也提到邦交正常化采取日本模式；美方一直把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从台湾撤军、终止防御条约的砝码，但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三者过早分离开来；美国希望在关系正常化后继续对台军售，但这个问题到卡特总统任职初期，一直是双方谈判中的遗漏问题，美方后来试图补救，但由于双方急于正常化，最后，双方以各自的理解暂时达成妥协。从此以后，美对台军售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此外，一些其他的限制因素也造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复杂性。例如，美国国内政治会以某些独特的方式进行干预，因此美方官员明白：其他的政策目标和选择结果会由于一个看似会出卖亚洲长期盟友的协议而受到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些因时间关系而造成的代价。例如，定期选举的政治制度再一次将本来可以寻求达成协议的时间段排除在外；定期进行短暂、高级别谈判的一个后果常常意味着美方官员必须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拟定联合公告。所谓美中谈判反复反复，其意义在于谈判常常是旷日持久、持续多年，以及美国想在中方心目中留下一个可靠的对话者的名声。因此，对于历届新的行政当局来说，即使它发现以前的立场不很恰当，也很难寻求具有突破性的谈判立场。此外，增加问题复杂化的因素还牵扯到与美国国际声望有关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即美国必须维护其作为可靠的同盟伙伴的名声，特别是维护美国在亚洲诸如南朝鲜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中的可靠同盟形象，尤其是在1975年春天西贡失利之后更显得尤为重要。

王仲春教授是军事院校的学者，他的论文具有军事特色。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一文中，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论述了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改善中国险恶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最高领导人做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美战略重大调整。其中，苏联的军事威胁是促使中国做出与美国直接对话与和解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动因。不能